

董子其人其学

□ 周桂钊

今天我讲董仲舒,主要讲三个问题。

生平考证

我们看看董仲舒是哪里人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里讲董仲舒是广川人。广川在历史上有个演变过程。最早的时候广川是个国,有我们现在半个省那么大,后来改称广川郡,像地级市一样,再后来是广川县,现在是广川镇。广川镇在河北景县,景县的人认为董仲舒是广川人。

紧挨着景县的枣强县则认为董仲舒是枣强人,枣强有座两米多高的董仲舒石像。枣强有个地方叫后旧县村,原来旧县的县址在那里,后来搬走了,变成后旧县村。明朝时董仲舒石像是在太行山刻的,刻好以后用马车拉着往东走,走到后旧县村马怎么也不走了,有一个人认为董爷爷可能就在这个地方,于是,董仲舒的石像就被立在这里。然后枣强县的人说,我们这个地方是董仲舒的老家。这两个县挨得很近,但是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,因为汉代的郡很大,起码有十几个县这么大,挨得那么近,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一边的,但是这两个县现在都属于衡水市。西汉时代,枣强和景县都属于广川郡。景县在过去也曾属于德州。德州《地方志》记载有董子读书台,于是德州也以董子读书台名义创建了一个景区,树立高大的董子石像。总之,董子故乡很难确定,但说董仲舒是衡水市人或者河北人都可以,都不算错。

《史记》记载“董子三年不窺园中菜”,有人认为他认真读书,所以没有时间看菜园。认真读书成了习惯,不会只有三年不窺园。三年不窺园,应该有特殊情况,像现代学生准备高考一样。董仲舒一生最特殊的情况就是准备参加对策,要准备皇帝提出的问题,这是仕途中关键环节。因此,我们推测他参加对策前三年开始做准备,没时间去菜园。

这三年是什么时候?董仲舒那时多大?史学家写历史,习惯按时间前后顺序来写。董子先当《春秋》博士,进行教学,三年不窺园,然后对策,被任为江都相。但《史记》没有记载对策的事,班固《汉书》将董仲舒对策列在元光元年。西汉桓谭说董仲舒“年至六十,不窺园中菜”,这样推算董仲舒对策时约六十四五岁。董仲舒生于高祖时代,约公元前198年。他应该是活到七十七岁,才得以致仕。

董仲舒的思想精华

第一点,是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。大一统是《春秋公羊传》里首先提到的,后人对这个词有多种解释:一、大是赞扬词,形容“一统”的伟大。二、大是形容词,指大局方面要统一,生活细节上就不必强调统一。这些说法,都有道理。董子本人讲的是什么意思呢?这可以从董子三对策的最后说法来体会。他认为,《春秋》大一统是世界普遍原则。现在教师有自己的不相同的道理,各人也有不同的理论,百家不同方法,没法统一起来,法则常变化,下级不知道要坚守什么。董子提出要坚守的是“六艺之科,孔子之术”,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。董子把他抬到独尊的地位,其他学派的思想放低,不与孔子并列。这样下级知道要坚守什么,平民也知道服从谁。后人总结出这一思想原则就叫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

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就是说,不是孔子的那一套东西,就不让它宣扬出来,这样就突出了孔子儒学的领导地位。后来别人把他归纳为“独尊儒术”,这是董仲舒的思想,但绝不是董仲舒的原话,是后人说的。

这样就把孔子的思想放在了

最高的地位,别人都听他的。但不是只许他存在不许别人存在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,讲《论六家要旨》,里面地位最高的是道家,儒家不是最高的。

到了司马迁以后,独尊儒术了,六家变成九家,增加了三家,虽然孔子的地位提高了,但是没有把别人消灭了,还保存有九家。“罢黜百家”并没有清除各家。

强调大一统,董仲舒很有历史经验。周朝的时候周天子权威很高,诸侯都听他的,分封建国。后来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下降,诸侯逐渐发展起来,就打起来了,把小国灭了,扩大自己。在先有一百多个国家,后来就剩下七个,七个还在打。

秦始皇统一以后,消灭六国,取消了封建制,改成郡县制。郡县制实际上叫中央集权制度。郡的行政长官是太守,太守管的那个都是代表皇帝去管的,军队不是他的,财政收入也不是他的,他自己的子孙也没有继承权。封建的时候,诸侯的子孙有继承权,齐国、鲁国都继承了三十几代。改成郡县制以后,这些太守经常被调动,子孙没有继承权,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中央集权专制制度,一切都由皇帝一个人独立裁决。

两千年以前跟现在不一样,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无疑是比同时期的西方更先进的制度。同时代的整个欧洲都还处在奴隶社会,有的还在原始社会。

第二点,董仲舒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在《对策》里提到的:德教为主,刑罚为辅。秦始皇时代是“以法治国”,那时候犯罪的人很多,吐口痰也抓起来,满街有一半都是寒民。王充举过一个例子,马没训练就让它拉车,拉得不对就杀了,再拉来一匹马重新拉,结果杀了一大堆马,地也耕不了,车也拉不动了,这都是错误的。秦始皇单纯地“以法治国”是片面的。董仲舒这一点应该说,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。提倡文化教育,提倡道德,这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。统治者治国理政,不能放任法律去惩罚,受惩罚始终是少数人。

第三点,董仲舒的“调均”思想也很深刻。他说,有的人钱多就很骄傲,就为暴,就欺负老百姓,导致社会不安定。还有一些人因为被压迫,生活不下去,上不能养父母,下不能养小孩,日子没办法过下去,所以起来造反,落草为寇。太富和太穷,对社会安定都没有好处,应该加以避免。东汉的时候遇到过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,皇帝就施行董仲舒调均的办法,哪儿丰收了就把粮食运到受灾的地方。这样,社会就很安定,大大减少了抢劫偷盗的发生。

第四点,董仲舒提出,当官的不能与老百姓争利,不能与民争业。董仲舒举了个例子:鲁国国相公仪休,有一天吃饭的时候看到菜,说这个菜多少钱买的,家里人说这个菜不是买的,是自己后花园种的。公仪休气坏了,到后花园把菜拔了,扔了。按照公仪休的意思,菜,我们不能自己种着吃,我们要去买。要是我们自己种菜,下面的大小官员都跟着学,都种菜,菜农种的菜就没人买了,就把他们的业务争过来了。争业,实际上也是争利,老百姓没法生活。

第五点,董仲舒在《对策》里还提出了一个怎么样提高国君权威的问题。皇帝权力大了,下面官员的权力小了,这才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认同。这也是董仲舒考察历史、考察现实之后的结论。汉景帝的时候,出现“吴楚七国之乱”,这是董仲舒在亲身经历的。七个国家强起来了,也不听皇帝的,后来周亚

夫带兵镇压下去。董仲舒也从这个事件中体会到,要使天下安定,要提高天子的权威,就要把诸侯的势力削弱下去。后来演变成“削藩”,这对巩固皇帝中央集权是很重要的举措。

第六点,董仲舒说了两句话: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。”“屈民而伸君”,一听就是压着老百姓提高皇帝的地位。但我说,这个“民”主要是指诸侯王,因为平民自己没军队,怎么翻天?往往都是那些诸侯王,被归到民里,这一类人是要压下去的。老百姓,不用压,他们自然都在最底层。但诸侯王却不行,“吴楚七国之乱”之前,很多人跟皇帝提出要削藩,他舍不得,不忍心,最后就乱了。所以,“屈民而伸君”里的“民”,不是普通老百姓,而是诸侯王。

“屈君而伸天”,是要求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。秦二世,没有天压着他,他怎么干就怎么干,以天字下人伺候他一个人,这就不能安定,所以要“屈君而伸天”,抬高天的地位。董仲舒拿天作为皇帝的紧箍咒,来制约他的权力,防止其滥用。

古今评议

最早写《董仲舒传》的是司马迁,司马迁说从刘邦到汉武帝这五世中间,最精通《春秋》经典的只有董仲舒一个。这是很高的评价,但其他的就没提。董仲舒著名的《对策》在《史记》里没提到,我认为,不是因为司马迁不提,是因为他没看到。汉武帝时代,荀子也没排上,因为班固写历史很严谨。甚至,就因为他很严谨,被抓起来,差点被杀了,后来他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我认为,班固写的东西没有任何胡编的,还是可靠的文本。班固写《汉书》的时候就发现董仲舒的思想影响很大,学生也很多,很多学生都当了大官,好几个,给予的评价就特别高,并且把董仲舒《对策》的全文都收进去了。班固称董仲舒为“群儒首”,所有儒生中间他是第一位的,“为儒者宗”,被后来的儒家崇拜得不得了。这两句话表明董仲舒是汉代最杰出的儒学领袖。

有一个学者说,司马迁没提到这个《对策》,班固《汉书》里有《对策》全文,说明这个《对策》是班固胡编出来的。这个说法没有根据,因为班固写历史很严谨。甚至,就因为他很严谨,被抓起来,差点被杀了,后来他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我认为,班固写的东西没有任何胡编的,还是可靠的文本。班固写《汉书》的时候就发现董仲舒的思想影响很大,学生也很多,很多学生都当了大官,好几个,给予的评价就特别高,并且把董仲舒《对策》的全文都收进去了。班固称董仲舒为“群儒首”,所有儒生中间他是第一位的,“为儒者宗”,被后来的儒家崇拜得不得了。这两句话表明董仲舒是汉代最杰出的儒学领袖。

后来王充的评价则更高了,高到什么程度呢?董仲舒可以跟孔子并列,“文王之文在孔子,孔子之文在仲舒”,周文王、孔子、董仲舒,三个巨擘一脉相承,都是圣人。孟子没排上,荀子也没排上,因为孟子、荀子在汉代已经很有名了,但按王充看来,还不如董仲舒。

有的人说董仲舒是讲天人感应的,王充是反对天人感应的,他们两个是针锋相对的。但是我仔细看了《论衡》,有62次提到董仲舒,只有两次对董仲舒表示怀疑,其他60次都是表扬的,而且表扬得很多,这就说明王充这个人实事求是。

现在有的人把董仲舒贬得很低,往往都拿西方的民主、平等、自由观点套解古代的内容,于是批评的声音就很多。他讲天人感应是“宗教神秘主义”“唯心主义”,他的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是形而上学,他支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封建主义的思想。但我认为,秦朝以后就不是封建社会了,封建社会就是周朝那一段时间。还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把董仲舒作为反面人物批了很长时间,但是最后没有一条能成立。后人批评董仲舒的,多数属于误解,而现在我们就要正面了解,发现董仲舒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起到的很大的推动作用。在他那个时候,他就是最先进的思想家代表。

董子公开课课程安排

主办单位:山东省委宣传部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
承办单位:山东省尼山书院(山东省图书馆)
教学单位: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
授课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分馆

第一讲 董仲舒其人其学

主讲人:周桂钊(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)
内容简介:略

第二讲 董仲舒与汉代新儒学

主讲人:吴光(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)
内容简介:董仲舒以“三年不窺园”的精神,阐发《春秋》等经典的“微言大义”,建立了新儒学体系。以“六艺之科,孔子之术”为基础,综合吸收了先秦各家之学。其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目的论,政治思想基础是德主刑辅王道论,道德伦理基础是“三纲五常”教化论,方法论基础是“天不变道亦不变,天道亦变”的历史辩证法。

第三讲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

主讲人:黄开国(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)
内容简介:董仲舒运用《春秋》“无达辞”的解经方法,以孔子“素王说”为出发点,视《春秋》为改制之书,借对三世异辞的书法发明,提出新王必改制的改制说。大一统、三统说、贵元重始诸说,奠定了春秋公羊学的基本理论,并对后来经学诠释的发展影响深远。

第四讲 “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”的历史真相

主讲人:秦进才(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)
内容简介:百余年来,学者们认为,董仲舒与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有关。其实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是清末才出现在蔡元培著作中的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”,罢黜了儒家在内的百家,设置传授中华经典的五经博士,以经取士,以经治国,皇帝裁判经学分歧,何来“独尊儒术”。

第五讲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

主讲人:张茂泽(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教授)
内容简介:天人感应论提出的历史背景;天人感应论的主要思想内容;天人感应论的历史地位;天人感应观念的理论化、天人合一学说的新阶段、大一统说三纲说改制说等的理论基础、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新成果。

第六讲 董仲舒的人性论

主讲人:李存山(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)
内容简介:董仲舒主要以“中民之性”论性,否认性善论,从而为“王教之化”的必要性作论证;但他认为人性中有“善质”或“善端”,由此经“王教之化”而成为“善”,这是与其“任德不任刑”的价值取向相符合的。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之间,董仲舒的人性论成为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。

第七讲 董仲舒的纲常之道

主讲人:方朝晖(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内容简介:“三纲”“五常”简称“纲常”。“三纲”偏重人伦,“五常”偏重道德。“纲常”是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。从现有文献看,董仲舒是最早明确使用“三纲”“五常”这两个术语来描述和建构上述价值体系的关键人物。如何从历史语境中来理解“纲常”的来源及含义?为什么它对后世有如此深远的影响?

第八讲 董仲舒“德主刑辅”的治理思想

主讲人:刘国民(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内容简介:董仲舒认为,天道之大者在于阴阳,天道任阳不任阴。天道是人道的根据,人道任德不任刑。汉承秦制,承袭了以刑罚治国的方式。董仲舒主张“更化”,希望把高刑高法的政治,改选易轍,尚德而不尚刑,使天下和洽,习俗纯美,万民安仁乐业。

第九讲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

主讲人:谢昶龄(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)
内容简介:董仲舒重建“王教”,遵循德教为主刑罚为辅的思路。首要的是奉天法古——坚定人们对上天、祖宗的信仰;理论上奉元,实践上正本。教化思路是讲义不言利、尊礼重信。官员是教化民众的关键,须以六经养德;选拔官员以贤不以功。提倡谦让品德,做人要“贵人贱己”。

第十讲 董仲舒的“调均”与社会公正思想

主讲人:李宗桂(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)
内容简介:董仲舒的“调均”主张,是其“更化”“改制”理念的具体化。他要通过改革调节贫富,防止并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。他反对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,但赞成给富人和穷人各得其所、各安其分的生活。他的调均主张,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公正思想。

第十一讲 董仲舒的大一统与更化改制思想

主讲人:韩星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)
内容简介:汉承秦制,诸多弊端。董仲舒认为必须“更化改制”:思想方面建议汉武帝以儒学代替黄老学说,设立五经博士,使经学成为指导思想;制度方面建议改正朔,易服色,重建礼乐,强干弱枝,官商分途,夷夏互变;文教方面建议置经师,兴太学,养贤士,选贤能。这为汉代的长治久安,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、文化认同、国家认同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第十二讲 董仲舒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

主讲人:余治平(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)
内容简介:董仲舒“法天而立道”,基于儒、宗子儒而又能够兼容并包,创造性地推进儒学发展。其大一统理念、天道信念、天人感应、教化纲常、德主刑辅、察举建言、调均更化主张,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基因。其天道哲学、政治哲学等对于推行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,都具有一定的建设性价值。

孔子是儒家“诗教”的创始人,“诗教”一词出自《礼记·经解》:“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。”“诗教”自产生以来,对其探源阐释颇多,将孔子的诗教与其门人对其思想进行阐释的《礼记》结合起来看,其核心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,那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曰: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,致广大而尽精微,极高明而道中庸,温故而知新,敦厚以崇礼。”朱熹认为“尊德性”是“存心养性”,“道问学”是“格物穷理”,“大抵子思以来,教人之法,惟以尊德性、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”(《朱文公文集》)。龚自珍说:“孔门之道,尊德性,道问学,二大端而已矣。”作为孔门之道的两大端,它实际上就是孔子诗教说的两大核心观念。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”,是要求真正的君子必须是两者兼而有之的。而孔子倡导的君子之道,也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这种君子之道的培养,是孔子诗教之重要内容。所以,“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”是君子之道的一体两面。

“尊德性”的“德性”,具体体现为圣人之性,是君子必须遵守的。简单地说,“尊德性”就是肯定人的德性是天生就有的,但由于为物欲所蔽导致“人之本心不明”,因此必须通过“诗教”(或整个六艺之教)时时“去此心之蔽”,以保持德性的不堕落。孔子“诗教”所谓的“无邪”,就是要“归于正”,而所谓“正”者,体现在《诗》中便是“仁”“礼”和“谐”。儒家“仁”的本质就是维护等级之礼、法规之礼、人际之礼、为人之礼,二者在《诗》中达于和谐统一。孔子盛赞“《诗》的好仁如此”,就是他“诗教”中“欲仁”“闻道”价值取向的展现。

“仁”是君子的本质特征,“仁爱”是君子的主要情感,孔子“诗教”的目的是让君子注重道德礼法,并让君子在遵循礼法规范上由外在的强制升华为内在的自觉和良知。所以孔子说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,其主张以礼教化和以德教化都是要求完成自身的道德修养。孔子借助《诗》把诗对人的性情熏陶引向“温柔敦厚”和“文质彬彬”。而“温柔敦厚”和“文质彬彬”的底蕴便是“仁”的德性:“仁”滋养着人的自然和质朴的性情。孔子“诗教”不仅倚重于《诗》,同样倚重于“礼”与“乐”,所以他有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之说。“兴于诗”在于以诗的情感涵养人的性情之真,“立于礼”是使这真性情得以由“礼”而导之以正。但“礼”是一种有制约作用的规范,在“礼”的制约下“真性情”的发展会受到限制,这样就需要“乐”来涵养。在“乐”这样的情、“诗”之根)涵纳了“理”(“礼也者,理也”),“礼”内蕴了“诗”,“仁”在这个时候才会在葆有天真而趋向高尚的意趣上得到圆融的提升。孔子的“仁”孕育了人的“德性”“性情”,使礼门开始从“修德立身”的立场来谈《诗》与《礼》,由《诗》所开启的“诗教”,第一次自觉地由人的内在要求出发,通过“诗教”提升人的精神境界,以“存心养性”。因此,“尊德性”作为“诗教”的核心价值之一,实质是将审美道德化,使审美成为沟通内在之“仁”与外在之“礼”的桥梁。

“道问学”则是指君子通过问学、求知的途径而达到实现至诚的德性境界。实现道德境界的途径只有读书致知,这本书就是《诗》为首的“六艺”。“道问学”是孔子对弟子

孔子「诗教」的核心观念

□ 刘恒

实施《诗经》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技巧。孔子很多有价值的教学方法是在他具体“引诗”“论诗”的过程中提出来的。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在《论语》中明确提出的三处“教”之内容:“子以四教:文,行,忠,信”(《述而》);“有教无类”(《卫灵公》);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,谨而信,泛爱众,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(《学而》)。这三处,“有教无类”是孔子“诗教”的教学原则;《学而》是对入学弟子的要求,最有价值的是《述而》的“四教”。这四教,文是文献典籍,行是德行或实践,忠是忠义,信是信用。这“四教”既是孔子的教学内容,也是孔子因材施教而采取的不同方法。文,行是外在的,忠、信是内在的。可以看出,孔子教育一个人是从诗书礼乐(文)、社会实践(行)、忠诚守信(忠)、思想情操(信)等方面去实行的。就道问学这端来说,孔子是一个经验主义者。他吟诗论诗的时候,出言从容而多平易亲切之语,对弟子所问“仁”“孝”“礼”“政”“德”“君子”等儒家义理进行随机指点,或评说叔齐、舜、禹、泰伯、文王、伯夷、叔及以及颜渊、子路等。不管是评点义理还是评点人物,都称《诗》引《诗》来启发弟子领悟他“一以贯之”的“道”(“仁于礼”)。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”之“教”、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的“为政”方略等。可以说,孔子“诗教”的主要任务就成为推广和阐释《诗经》的政教功能,阐释《诗》具有合“礼”性和“贵中合”的价值观,表现出重实用而轻审美的倾向。

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教育家,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完整的教育理念。在他看来,“诗教”之真正目的是个体精神和永恒本性的形成,“诗教”之真正目标是培养“为政以德”的君子。就尊德性而言,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,就道问学而言,它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和践履性,是形而下的技术。孔子的“诗教”思想,从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个方面发掘了《诗经》陶冶性情、培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,通过“人文化成”最终到达“内圣外王”,体现出一种“合内外之道”的精神境界和生存智慧。

(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)

國學